

《水浒传》作者考论

王晓家 著



《水浒传》作者考论

三尧家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水浒传》作者考论

王 晓 家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2 插页 16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4-00139-2/I·37

定价:9.50 元

前 言

这部书稿，最初完成于一九八六年六月。这是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的首届《水浒》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长篇学术论文所引起的。那篇论文题作《〈水浒传〉作者非施耐庵而系罗贯中考辨》，引起大会轰动。会后，全国二十多家报刊作了报道。嗣后，这篇长达二万六千字的论文分作两部分，分别发表在《水浒争鸣》一九八三年第二辑和《济宁师专学报》一九八五第二期上，前者题名为《〈水浒传〉作者系罗贯中考辨》，后者题名为《〈水浒传〉作者非施耐庵系罗贯中补证》（又见复印资料一九八五年第十二期）。在这期间，《文学评论》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上发表了拙文《〈水浒传〉作者及其他——与王利器先生商榷》（又见复印资料一九八三年第八期），《水浒争鸣》特辑（一九八三年）也发表了《读〈施耐庵故乡考察散记〉质疑——兼与卢兴基先生商榷》一文，加上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五年、一九八六年等几次《水浒》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和《戏曲艺术》一九八三年增刊发表的《罗贯中与〈风云会〉》，还有《艺术论坛》发表的《作为戏剧家的〈水浒传〉作者》等论文，计六万余字。这些论文，从对史料的挖掘、辨伪到运用系统论、比较论等方法，论证了《水浒传》与《三国志演义》等从思想立意、政治内容、艺术风格的异同以及《水浒传》本身的演变过程，从不同方面

全方位地探讨了《水浒传》的作者非施耐庵而系罗贯中。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以至导致了对施耐庵文物的鉴定。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学研究年鉴》于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连续四年作了综述和文摘，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文史知识》第十一期《八十年未对〈水浒〉作者的争议》、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千古之谜》、广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名著争鸣大观》以及《大众日报》等报刊书籍，对此观点也作了报道和摘录。譬如，《中国古代文学名著争鸣大观》一文中说：“我们认为，王晓家先生这种多方面的考证，大胆地假定论断的精神是很可贵的。这无疑对于《水浒传》作者的深入研究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鉴于以上，笔者愿以此作为抛砖引玉之作，奉献给广大读者以及学术界同仁。

作者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前 言	(1)
一、问题的提起	(1)
二、《水浒传》成书年代、素材来源及其作者	(4)
三、“施耐庵”其人考	(6)
四、“施耐庵”非施惠辨识	(16)
五、罗贯中非浙江与山东人辨	(30)
六、太原罗贯中于明初写《水浒传》辨	(35)
七、罗贯中失去《水浒传》著作权始末	(41)
八、“施、罗二公”“并肩”考	(45)
九、《水浒传》与《三国志通俗演义》	(48)
十、《水浒传》与《隋唐两朝志传》	(86)
十一、《水浒传》与《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88)
十二、《水浒传》与《北宋三遂平妖传》	(99)
十三、《水浒传》与《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103)
十四、作为戏剧家的《水浒传》作者	(117)
十五、作为思想家的《水浒传》作者	(131)
十六、从乡土观念看作者	(159)
十七、从对待妇女的态度看作者	(165)
十八、从民族意识看作者	(171)
十九、“施耐庵”与“湖海散人”	(184)
二十、结束语	(201)

- [附录一] 《水浒传》作者及其他
——与王利器先生商榷…………… (202)
- [附录二] 读《施耐庵故乡考察散记》质疑
——兼与卢兴基先生商榷…………… (222)
- [附录三] 有关“施耐庵”、罗贯中的资料辑录…………… (237)

一、问题的提起

《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

现在，出版的一些有关《水浒传》的著作的署名，往往各行其是，不够统一。譬如，一九七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全传》，其署名就写着“施耐庵、罗贯中著”。又如，一九八〇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七十回本《水浒》，其署名则写着“施耐庵著”^①。这个版本，承袭了金圣叹把《水浒传》著作权归属于“施耐庵”的传统作法，乃不题署罗贯中的名字，这是不够公允的。同时，也就出现了问题：最早编著《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是“施耐庵”呢还是罗贯中？抑或二人合著？据高儒《百川书志》^②和郎瑛《七修类稿》^③中有关的文字记载，过去早就有题作“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作法了。明人袁无涯刊刻的百二十回本《水浒传》，就题作“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④。镜水湖边老渔在《〈荡寇志〉跋》中谈到《水浒传》的作者时说：

①根据张国光同志的意见：新版本——七十一回本，和旧七十回本即金圣叹的批改本，是不能等同对待的。详见张国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论〈水浒〉七十一回本与七十回本的思想分歧》一文，载《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②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

③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三。

④见袁无涯刻本《忠义水浒全书》。

……（《水浒后传》）其《论略》云：“《水浒》曾见本传，称古杭罗贯中撰，又有归之施内（耐）庵者，或施、罗合笔，如王实甫、关汉卿之《西厢》是也。”①

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转引诸城邱太常海石过梁山泊诗云：

施、罗一传振千古，卓老标题更可悲。

今日梁山但尔尔，天荒地老渐无奇②。

看来，有不少人把施耐庵、罗贯中看成了《水浒传》的共同作者，这大概就是有些出版社在出版《水浒传》时署名“施耐庵、罗贯中著”的基本依据。熊飞刊刻《英雄谱》（把《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合刻——引者注）时，则题署为“施耐庵编辑”③。这大概又是有些出版社在出版《水浒传》时署名“施耐庵著”而挖掉罗贯中的名字的一个主要原因。钱曾在《也是园书目》卷一〇《通俗小说》类著录中有“旧本罗贯中《水浒传》二十卷”④的话，可惜不被人重视。有些刊本如容与堂《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⑤百回本，就不题撰人名字。这种任意题署，翻版刻印的做法，大多出于一些帮闲文人和为了赚钱牟利的书贾，不足为怪。所以，严敦易先生认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七十一回本《水浒》，应题作“传施耐庵，罗

①镜水湖边老渔：《〈荡寇志〉跋》，见《荡寇志》卷首。

②阮葵生：《茶余客话》。

③见《英雄谱图赞》本。

④钱曾：《也是园书目》卷一〇《通俗小说》。

⑤见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影印本卷首。

贯中编辑”^①。赵景深先生是同意“这个建议”的，并认为“至少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以前，这样署名比题‘施耐庵著’要妥当得多”^②。前不久，张国光同志根据近年上海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认为：《水浒传》故事经过封建艺人的广为传播后，“又由封建文人，冒充罗贯中之名，并托名施耐庵（实无此人）对它进行加工。因此出现了艺术价值较高的百回繁本《忠义水浒传》。”^③我是同意张国光同志关于“实无”“施耐庵”“此人”的说法的。

不过，对于“罗贯中之名”是否系由“封建文人”“冒充”这个问题，还必须在占有翔实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结合着《水浒传》的本身如成书年代、版本源流、思想内容、语言艺术、作品比较等方面进行一番研究和考证，在分析、综合和比较中，方能得出较为切合实际的结论来。

①②转引自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关于〈水浒传〉的作者问题》。

③张国光：《金圣叹和他评点的〈才子书〉》，载《湖北日报》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二、《水浒传》成书年代、 素材来源及其作者

考察《水浒传》的成书年代、素材来源，我们只能作一个大概的推断：成书于元末明初；创作素材主要来源于民间传说故事即所谓“街谈巷语”^①，并参考一些正史、野史、笔记和杂记之类的书籍，从中摄取生活原型，加上元、明杂剧中有关“水游戏”的部分，逐步丰富、充实、发展和演变而来的。

宋末遗民龚圣与（龚开）所作《宋江三十六赞》自序说：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者。虽有高人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壮时，慕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②。

由此可见，最晚至宋末，宋江等“水浒”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开了。而且，这些故事都是如同《史记》那样，系传记体式，不过，系民间口头文学罢了。

①②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

查历史文献上的有关记载，在南宋一百零七种话本目录中，公案类有“石头孙立”，朴刀类有“青面兽杨志”，杆棒类有“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等^①。到了元朝初年，便出现了一本无名氏的《大宋宣和遗事》^②。在这本书里，有关记载“梁山泊聚义本末”的“水浒”故事，则已有劫取生辰纲、杨志卖刀、宋江私放晁盖、刘唐下书、宋江杀阎婆惜等情节，把正史和野史以及笔记、杂记等结合起来，开始由短篇“话本”进而向长篇“讲史”和演义小说过渡。这时候，《水浒传》的架子已经基本搭起来了，但只是初具雏形。并且，内中的文字非常粗糙、简略、古朴，总共也只有四、五千字。尔后，便以此为基础，《水浒传》的作者丰富和补充、发展了这些情节，并根据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的要求，加进了“大破辽”、“灭方腊”等虚构的情节，强调了招安抗辽的积极意义，用以贯彻作者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情绪，升华爱国主义思想，在宋江等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愿望。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水浒传》通过抗辽隐喻着一种反元情绪，通过表现“官逼民反”的哲理表现了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叉，通过表现现实中的矛盾，反映了作者既想“替天行道”又想“忠君”报国的矛盾心理和矛盾思想。

以上，只是就现有的材料简略地论述了《水浒传》成书的年代、创作素材的来源以及流传演变过程。下面，我们就来考证一下《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谁？首先，我们来分析考察一下，到底有没有“施耐庵”其人。

①罗烨：《醉翁谈录》。

②见《水浒资料汇编》卷五。

三、“施耐庵”其人考

关于“施耐庵”的材料，既不见于正史记载，野史、笔记以及杂记等书上的记载也寥寥无几，并且记载得十分笼统、简单、琐碎、零乱，只是从字里行间和片言只语中不十分确切地假定他是《水浒传》的作者。也就是说，直到现在，还没有查到一条记载明确无误而又经得起推敲，肯定他就是《水浒传》的作者，即“始作俑”者。

明人胡应麟在《庄岳委谈》中说：

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率以其凿空无据，要不尽尔也。余偶阅一小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细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也^①。

仔细研读胡应麟的这条记载，感到问题有三：

一是胡应麟所说的“元人武林施某”，并没有直接点出“施耐庵”三字。查南宋遗民周密所著《武林旧事》一书卷六《诸色伎艺人》一节文字中的“小说类”，有一个御前讲小说

^①胡应麟：《庄岳委谈》，见《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辛部。

的施珪^①，这个施珪，或许与《水浒传》的作者有些瓜葛和牵连，后人便据此衍化出“施耐庵”三字，并把他安排在元末明初这段时间里生活，由宋人变成明人，也不无可能。但毕竟只是一种猜测性的假设而已。看来，胡应麟所说的“元人武林施某”，并不能断定就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周密由宋入元，胡应麟是明人。胡应麟所说的这个“元人武林施某”，也可能与周密同时。但这样就有了问题，《水浒传》成书的年代问题，就必须由元末明初上溯推到宋末元初。隔了整整一个朝代，这是不可思议的。

二是胡应麟说他“偶阅一小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这话本身就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片面性，含有猜测和假定的成分在里面。当然，也就不足作为凭据了。况且，胡应麟所说的“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的话，模棱两可，含含糊糊。其实，《水浒传》与《三国志演义》成书的年代谁先谁后，都成为问题呢。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第三本第三章谈到《水浒传》时，一开始就说：

元末明初，伴随着《三国志演义》的产生，另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出现了。它以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屹立在我国文学史上，成为封建社会文学的一个高峰^②。

①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中国文学史》三，第八五四页。

我是相信《三国志演义》要比《水浒传》成书年代早的说法的。因为《三国志演义》中流传的“三国”故事，要比《水浒传》中流传的“水浒”故事早得多。“水浒”故事至南宋始有记载，而“三国”故事早在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骄儿诗》中就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早在李商隐的那个时代，“三国”故事已妇孺尽知了。

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当时北宋都城汴梁地方，有专门讲“三国”故事的民间艺人，到元朝至顺年间，便出现了《三国志平话》等书面的东西。元人王沂《虎牢关》诗中说：“君不见《三分》书里说虎牢，曾使战骨如山高。”这些，都已成为《三国志演义》的参考材料或创作素材了。

此外，元代的诸宫调和杂剧，也丰富充实了《三国志演义》的创作。石君宝《风月紫云亭》中说：“我唱的是《三国志》，先饶十大曲。”

可见，《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要比《水浒传》早得多。所以说，胡应麟的这条记载，其可靠程度就成为问题了。他既没有肯定“施某”就是“施耐庵”，又记述得前后矛盾，相悖情理，既不可靠又不可信。

不过，有些人会找出《水浒传》的作者为“施耐庵”的第二条凭据加以证明，这就是杨新所作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对于这个问题，也要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

“墓志铭”上说：

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汤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指明初——引者注），征书下至，坚辞不

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得称。生以谦，少有操志。续长，先承家业。父母以孝，兄弟以友，朋友以信，人无间焉。自以耕学扁斋，潜德弗耀，娶孺人顾氏妙善暨陈氏妙真，皆自名门，淑德昭著。永乐辛丑岁，公上章困教，甫及四十，以疾终①。

这条凭据也有问题。起码有如下几点可疑。

其一，这是清代后期咸丰年间的一条材料，时间太晚，且又系从族谱上转抄而来的，免不了有些捕风捉影，拉名人“就位”。“施耐庵”既然是“元至顺辛未进士”，好不容易中了进士，为什么又“高尚不仕”，不愿意做官了呢？元至顺辛未是元文宗图帖睦尔至顺二年，即公元一三三一年，正为元代中期，说他因系汉族知识分子而有不愿仕元的民族情绪，既然如此，那么，他根本就不该在元朝相对稳定的中期去考“进士”。况且，《水浒传》中所表现的“大破辽”，本身就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民族意识，“施耐庵”作为一个元朝的“进士”，何以又在《水浒传》中贯穿他的这种思想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其二，“施耐庵”既然不愿仕元，表现了汉族知识分子不愿与外族统治者合作的民族意识，那么，当朱元璋以明代元，光复华夏，他应欢欣鼓舞，尽力辅佐“真主”才是，何以“征书下至”，仍“坚辞不出”呢？显然，这不是“忠臣不保二主”之类的言辞所能讲得通的。“施耐庵”的这种思想，既与《水浒传》中所表现的“大破辽”的爱国主义民族意识相抵

①杨新：《故处上施公墓志铭》，清咸丰四年修《施氏族谱》引，据《文艺报》一九五二年第二十一期转录。

触，又与《水浒传》七十回前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官逼民反”的造反情绪相悖谬。况且，杨新说他“隐居著《水浒》自遣”的话，与李贽所说的《水浒传》系“发愤之所作”^①大相径庭。相反，却与金圣叹所说的“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事非皆不谬于圣人”^②的话，倒颇一致。

其实，金圣叹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上（金圣叹鉴于明末文字之祸，不敢直说《水浒传》为“发愤之所作”，故用游闲著文，“写出自家”“锦心绣口”之类的话作幌子，如同《红楼梦》的续作者高鹗为了逃避清代文字祸，并使《红楼梦》广泛传播，力图把《红楼梦》纳入他的“尚不谬于名教”^③的轨道一样，金圣叹也用评点的办法，力图把《水浒传》纳入他的“其事非皆不谬于圣人”的轨道上，（以便使之广为传播——引者注），是有他自己的功利是非观念和道德标准的。为此，他甚至托名伪撰《水浒传》的序文为“施耐庵”所写呢^④。

其三，“墓志铭”说“施耐庵”“生以谥，少有操志”，与铁珊等所说“施耐庵作《水浒传》，子孙三世皆哑”^⑤又相矛盾了。“墓志铭”说“施耐庵”之于施以谦“生七子”“女三”，“子文昱（长子——引者注）等又能继述”，这又俨然是一个“书香门第”了。既然如此，那么，“墓志铭”上怎么没有做明朝官的人呢？

①见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影印本卷首。

②④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首。

③程本本《红楼梦》卷首。

⑤铁珊：《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卷首。